

## 上海人口年龄结构转型及其长期影响

Change of Age Structure of Shanghai's Population and Its Long-term Influence

朱国宏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上海 200433)

所谓转型,这里指年龄结构的类型转变,如从年轻型转变为成年型,从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这种类型转变是人口转变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育率转变的结果。所以,生育率下降的后果可以归结为年龄结构类型转变的后果。由于年龄结构类型转变滞后于生育率下降,因而生育率下降后果往往也滞后于其下降过程。我国生育率下降自 70 年代初开始,但年龄结构类型迄今仍处在成年型,其后果尚处于潜伏期,不易为人所觉察。但由其特殊性所决定(下降快、降幅大),一旦在年龄结构上发生进一步的类型转变(成年型到老年型),其后果将是十分严峻的(迅速而猛烈)。因此,在其初露端倪的时候探讨其可能的后果是十分有意义的。上海作为中国生育率下降最早的地区,年龄结构类型已进入老年型,其后果也已初露端倪,以它作为个案来探讨其长期后果是十分合适的。

### 一、上海人口: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

从人口的角度来观察上海是十分有趣的。它是中国人人口最多的城市,又是人口增长最慢的城市(已形成负增长);它是人口迁移受严格控制的城市,又是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占上海人口约 20%)。于是,从生活在上海的人口说,上海仍受着不断膨胀的人口压力,但同时,上海的户籍人口生育率之低为其它地区或城市所不及(1992 年总和生育率为 1.33)。也就是说,上海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人口膨胀的压力,一是人口低生育率的压力。

因此,对于上海人口的考察,不能孤立地只看到人口膨胀(主要是流动人口膨胀)的压力,也不能只看到人口负增长的挑战。上海人口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户籍人口,另一部分是流动人口。因而,上海人口的概念也可以有两种,一是单指户籍人口,另一是包含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两部分。

以户籍来统计人口,为研究生育率下降后果提供了有利条件,那就是可以更真实地观察到相对封闭的人口结构及其变动,从而更真切地理解其意义。而将流动人口考虑进来,则可避免片面的断言,可以更全面地把握上海人口问题的实质。

### 二、上海人口的转型:生育率转变及其含义

上海人口在 50 年代前期已实现死亡率的转变(降至 10‰ 以下),因而决定上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转变。

上海的生育率转变开始于 50 年代后期,完成于 60 年代中期,如果以出生率约 15‰ 作为完成转变的标志,则 1965 年以后上海已进入低生育率时期(此后是其波动下降时期)。从总和生育率指标看,上海的总和生育率 50 年代为 4.75(最高时的 1954 年为 5.44),60 年代为 2.83,70 年代为 1.44,80 年代为 1.29。

在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年龄结构类型也在不断转变。50 年代,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无疑属于年轻型,1953 年的少儿人口(15 岁以下)比重为 33.02%,老年人口(65 岁及以上)比重为 1.97%。到 70 年代进入成年型,1973 年少儿人口比重降为 26.27%,老年人口比重则上升到 5.94%。而到 80 年代,开始进入老年型,少儿人口比重为 18.26%,老年人口比重为 7.43%。1990 年上海老年人口比重达到 9.38%。

从生育率转变过程与年龄结构类型转变的联系看,上海年龄结构的类型转变明显滞后于生育率转变。当生育率在 50 年代后期开始转变时,对年龄结构类型几乎毫无影响,直到完成生育率转变,进入低生育率时期一段时间后,年龄结构类型才开始第一次转变,而低生育率时期又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年龄结构类型开始第二次转变。如果以 1973 年

作为第一次转变的界线,年龄结构类型的第一次转变滞后于生育率转变至少 15 年(这也是同一批少儿人口进出该年龄组所需的时间);如果以 1982 年作为第二次转变的界线,年龄结构类型的第二次转变则更滞后于生育率转变至少 25 年。

如果以 1982 年作为上海人口完成两次类型转变的时间起点,则上海人口完成转型已经十多年了,维持低生育率状态则已将近 30 年。而长期低生育率的后果必然要显现出来。

事实上,上海人口长期低生育率的后果业已显现出来了,而且首先在人口本身体现出来。那就是,1994 年上海全市户籍人口出现负增长。

负增长仅仅是人口增长状态反向转折的标志,而不是低生育率后果的标志,但由负增长的形成可以推断,上海人口低生育率的后果已经存在,并愈益引人注目。

如果以负增长的出现作为低生育率后果足以引人注目的标志,那么,上海人口由生育率开始下降到负增长出现经历了近 30 年时间。由此似可推断,全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后果将在 2000 年前后变得十分的引人注目,因为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开始于 70 年代初。

### 三、上海人口转型的特征和意义

由前述,上海人口的年龄结构类型转变有两大特征,一是滞后于生育率转变,一是转变迅速。前者已如前述,后者则与生育率转变的过程相联系。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从 50 年代的接近于 5 下降到 70 年代的不足 1.5,短短的 20 年时间里下降了三分之二强,而西方国家的相应历程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故不能不说是迅速下降,且降幅之大令人惊叹。总和生育率低至 1.5 意味着已不足以保证人口的简单再生产(低于更替水平)。

这也就引出一个问题,上海的生育率为什么转变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其意义何在?

原因似乎很简单,因为上海是严格实行人口控制的城市,极低的生育率与政策的目标要求是相一致的,因而似可归为人口控制的结果。但是,问题在于,同样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为什么上海率先进入负增长?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用政策实施来解释。应当承认,上海的计划生育工作十分扎实和严密,因而也十分有效。但是,这种有效性还与上海这个特殊的城市的某些特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上海作为一个城市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我国最大的特大城市,也是三个直辖市之一。在政策上,它有着其它城市所不能比拟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其发展过程与其它城市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既

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也体现在城市的生活水平、文化条件、社会观念、舆论环境乃至城市历史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特殊性,使得其既有严格管理的传统,又有严格管理的条件。从生育率下降来说,我国严格的人口控制开始于 80 年代初,上海虽然人口控制开始较早,但严格化应当也是在 80 年代初才开始的。而在 80 年代,上海的生育率早已完成转变历程(两次波动有其特殊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生育率转变并非严格人口控制(80 年代意义上)的结果,而是生育观念转变的结果。这种生育观念转变有人口控制的作用,如 60 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和宣传的作用,也有城市现代化的作用,或者说,是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生育率转变被看作是走向稳定人口的必由之路,因而在价值取向上被认为是必要的、有利的。而且,这一过程使得年龄结构趋于稳定化,对于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也是有利的。这有时也被称作“人口的现代化”。

不过,在“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有必要注意两点。一是这种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消弭,而只意味着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人口问题出现。也就是说,高生育率有高生育率条件下的人口问题,低生育率同样有低生育率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所以,上海人口出现负增长,在看到它预示着“人口现代化”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另外一类的人口问题(或称“负增长问题”)正在悄然形成,同样应予以关注和重视。另一点是必须注意到特定“人口的现代化”的特殊性。上海人口在生育率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中下降快、降幅大,这就意味着,生育率下降的后果将不同于下降慢、降幅小的国家的情况。以人口老龄化问题为例,在西方国家的经验历程中,人口老龄化问题早已出现,但由于其生育率转变过程缓慢,其老龄化程度迄今仍较轻微(虽然老年人口比重 10% 以上已被看作十分严重的老龄化)。而上海人口的老龄化,不仅将迅速发展,老年人口比重从 1982 年的 7.43% 到 1990 年的 9.38%,而且仍将迅速发展,且程度上将是十分惊人的。据预测,到 2000 年将超过 10%,到 2030 年前后达到 30% 以上,后者的老龄化程度,就连已经严重老龄化国家也不曾达到,也不可能达到。如果说,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当加以重视的话,那么,对于上海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就不仅仅是重视而已,而是要及早地、迅速地予以严重关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因为,人口老龄化后果的长期性和严峻性丝毫不亚于 50 年代人口高峰的后果。

### 四、转型中的上海人口问题:后果和启示

人口老龄化只是生育率下降的后果之一。实际

上,生育率下降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决不止于人口老龄化一端。从年龄结构类型转变上看,如将年龄结构划分为少儿人口(15岁以下)、成年人口(15~6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三部分,则还有少儿人口比重下降的问题(与之相联系的则有独生子女问题、婴幼儿保健问题、儿童培养和教育问题等)和成年人口比重从上升到下降变化的问题(与之相联系的则有就业问题、劳动力培训问题、劳动力资源短缺问题等)。可以说,年龄结构三大部分人口比重的相对变化均引起相应的人口变化,从而引发人口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新矛盾。和高生育率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样,低生育率或人口转型所引起的问题同样是全方位的、复杂的、深刻的。所不同的是,问题的性质和再现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生育率下降后果,对于具体人口来说,譬如上海人口,也许区分为转型中的后果和转型后的后果更恰当些。因为,转型后的后果和转型中的后果在形式和程度上均有所不同。上海人口正处于转型之中,比如人口老龄化,必须在2030年前后老年人口比重达到峰顶(30%)以后才属于转型后,而此前均为转型之中,即从初步老年型到高度老年型的进一步转型(区别于成年型到老年型的转型)。区分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对于认识上海目前的人口问题有所裨益。

上海人口出现负增长后,引起各方注意,同时各种可能的后果也被郑重指出。但是,应当说明的是:

第一,在许多时候,低生育率或人口转型的后果被简单地归为负增长的后果。譬如人口老龄化问题,实质是低生育率的后果,但人们往往只注意到负增长与老龄化的联系,似乎没有出现负增长不至于有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事实正好相反,长期低生育率必定引起人口老龄化,但人口老龄化与负增长并无必然联系。

第二,转型中的人口问题和转型后的人口问题被混为一谈。譬如,上海人口出现负增长之后,一种担心油然而见诸报端,那就是劳动力短缺问题。对于一个封闭人口来说,转型后确实会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但是上海人口尚处于转型之中,即使人口总体不变,劳动力短缺也将发生在下一世纪30年代以后,何况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大城市,无须担心这个问题。在西欧国家,曾经用“客籍工人”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而在上海,事实上在目前庞大的流动人口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充当了“客籍工人”的角色(打工仔、打工妹),以致目前上海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过剩。如果取消户籍,这

种情形还将加甚。退一步说,即使真正出现劳动力数量的短缺,也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来增加人力资本。

第三,将低生育率的后果和人口控制简单地相联系,容易简单地将后果推诿于计划生育政策。应当指出,在我国的生育率下降过程中,人口控制确实起了主要作用,生育率转变中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然而谈到生育率下降后果,应当将其与计划生育导致的后果区分开来。因为如前述,不论是否实行人口控制,生育率迟早要下降并完成转变,其后果迟早要出现,因而这些问题并非由人口控制所造成,只不过由于人口控制加速了其转变过程,从而也加速了问题的出现。因此,如果说计划生育对后果有作用的话,它只是提示人们生育率下降后果问题的更快形成。同样,不能以生育率下降后果问题的出现作为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借口,事实上在中国乃至上海,改变计划生育政策无助于解决生育率下降后果问题,至多在形式上有所减轻,但引出的问题和付出的代价同样严重。

处在人口转型中的上海的人口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流动人口问题,另一类是户籍人口问题。就参与上海经济生活的那部分外来人口而言,他们实际上已构成了上海人口增长的一部分,而这部分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十分特殊的,其生育率也不同于户籍人口,因此必须重视这部分人口及其影响,包括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

就户籍人口而言,如果继续执行严格的人口迁移政策,可以推测,负增长不仅仍将继续,而且负增长率将趋大(因为随年龄结构推移,死亡率有上升趋势)。但其问题主要不在于负增长本身(即不在于人口减少),也不在于劳动力短缺,而在于人口结构变化。首先是年龄结构变化引起的问题,如前所述及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及老年社会保障问题;其次是家庭结构变化引起的问题,如前所述及的独生子女问题及其培养教育问题;最后是由年龄结构变化和家结构变化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产业结构调整、城市设施调整、医疗保障体系调整等。

如前述,上海的人口处于转型过程中,因而生育率下降的后果问题尚处于初露端倪阶段。如果以负增长的出现为契机,重视并正视问题的存在及其长期性、严峻性,不仅这些问题本身能够得到解决,而且上海人口也能够最终走向稳定化。

(本文使用的数据资料引自胡焕庸主编的《中国人口·上海人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钟德浩主编的《上海人口市情,1993年》,上海市人口普查办,1993年。)(责任编辑 孙立明)